

可贵的自省、慎独精神

——从《一件小事》看鲁迅怎样对待文化传统

唐 荣 昆

70年前,即“五四”运动发生的那一年,鲁迅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中,向全中国的成年同胞发出号召,要人们肩负起这一神圣的义务:

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(孩子们)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,此后幸福的度日,合理的做人。

这震天撼地的话语,本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,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除旧、布新,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。但是,由于几千年以农立国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的惰性,鲁迅的谆谆教诲,逐渐被人们淡忘、疏忽,甚至背弃了。

然而,历史却是无情的,当暴虐的皮鞭抽打了人民的背脊之后,痛定思痛,人们才重新想起了鲁迅的功绩。

1936年10月,鲁迅逝世后不久,郁达夫在《怀鲁迅》的悼文中,写了这样一段话: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,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;有了伟大的人物,而不知道拥护、爱戴和崇仰的国家,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而今,过了五十多年,我们才真正体味到这句话的真谛。——“最可怜的生物之群”、“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”,拿来形容那黑暗岁月中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,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这日子已经过去,但惨痛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。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、崛起,我们对鲁迅这一伟大人物的“拥护、爱戴和崇仰”,不能停留在口头上,或仅仅保存在心里,而是要切实地行动起来。

70年前,鲁迅深感改造国民精神之刻不容缓,并发出了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吁。为了让几万万中国同胞,从封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,与“因袭”的道德观念“彻底决裂”,他用笔投入战斗,夙夜匪懈,竭力尽瘁,献出了毕生精力。在“五四”文化运动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,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”的“两大旗帜”下,鲁迅真正是一员“凶猛的闯将”。可惜的是,我们这些后来人,对他的作品往往领悟不深,没有看到他“每作一篇,都是‘有所为’而发,是用在改革社会的器械”^①。于是,在评介讲析中,难免抹煞了它的锋芒,减弱了它的威力。这样,从客观效果来看,也就是让种种“因袭”观念在民族群体中继续潜藏下去,甚至得以“沉渣泛起”。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,现在,当我们重新捧读鲁迅的篇章,内心是怀着深重的歉疚的,真正是“时时熬了苦痛”“想到自己”,也想到远远近近许许多多的人。

这里将要着重论析到的《一件小事》,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许多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。许多人认为小说的主旨是“歌颂劳动人民的崇高品德。”——其实这只是作品

的一个局部，并不能包涵全篇。有的人认为小说表现了“从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中体现出革命的力量”和“革命的希望”，“看到了祖国光明远大的前途”的题旨。——这样一来，便无法理解“五四”革命高潮之后，鲁迅为什么又转入“彷徨”？继《呐喊》之后，第二部小说集为什么题名为《彷徨》？有不少的人认为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克服“个人主义”、“自私自利的劣根性”。——这样，完全不符合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历来所持的观点。持此论者也从未引述过除作品本身之外的任何材料，加以证明。

我认为，《一件小事》对知识分子身上背负着的“因袭的重担”，是作了深刻的挖掘的；而且，作品更侧重在褒扬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美好品德。

《一件小事》通篇只九百来字，可说是一篇微型小说。然而，它的简洁精炼，它的容量之大，开掘之深，实在是令人惊叹的。

请看小说的开头一段：
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
这里写到了一个中心人物：知识分子的“我”；写到了他所生活的环境：民国初年，军阀统治下的“乡下”和“京城”。这样的一个人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，他就自然而然地会在内心产生一种“坏脾气”，而且日益“增长”起来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？对于这一问题，以往的评论者，是没有做过令人满意的回答的。

鲁迅说过：“我的文章，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。”^②跟鲁迅同时代的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是这样，今天的青年就更不用说了。如果对中国社会世态，以及它的历史传统，没有足够的认识 and 了解，真正是难以读懂鲁迅的作品的。对《一件小事》历来的误解之多，也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我认为，要了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“我”以及他的“坏脾气”，有必要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处境，以及他们的人生态度、处世哲学，作一大略的考察。
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抱着“士为知己者用”^③的人生态度的，正如俗话所说“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。若是遇到顺境，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世所用；处于逆境，则只顾保全自己，或当个隐士，将知识和才能藏之名山，束之高阁，终于老死山林。孔子在《论语·公冶长篇》所说：“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。”孟子《尽心篇》所说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这些便是封建教育培养下的许多知识分子，历来所崇奉的生活信条。汉末三国时代著名的知识分子诸葛亮，他在《出师表》中对自己出仕任职之前的生活态度，是这样表述的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后来又为什么出山辅佐刘备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？对此他也作了说明：“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”一句话，就是为了报答刘备的“知遇”之恩。象诸葛亮这样的立身处世的态度，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中，是很典型，很有代表性的。

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，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当作“商品”，作为投靠“明主”的资本，待价而沽。说穿了，就是一种“奴性”；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必须依附于皇帝——“君主”或某一显官，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，实现自己的抱负。李白在《与韩荆州书》中说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王安石在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说：“某……受命于人主。”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也说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因为，

他们的头脑里有一个牢固的观念，认为整个国家社会、臣民、土地、山河、草木，一切都是皇帝的。所谓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④海瑞的《治安疏》开头便说：“君者，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。”历代的知识分子，大都超脱不了这一传统的观念。当统治者昏庸无道，朝纲靡乱，时局动荡，处于“乱世”的时候，知识分子就只好采取“明哲保身”，“独善其身”的处世态度了。

鸦片战争以来，至“五四”运动，乃至封建军阀统治的整个时期里，中国社会一直是处于“内忧外患”，“灾难深重”的“乱世”。封建时代深受孔孟儒家教育熏染的知识分子，生活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，绝大部分都是抱着“苟全性命”、“独善其身”的处世态度。对知识分子这种精神状态，鲁迅是深有所了解的。鲁迅少年时代“三味书屋”的老师寿镜吾，就是一位“明哲保身”的知识分子。他“方正、质朴、博学”，得到学生、家长、乡里广泛的赞誉。但他60年如一日，勤勉负责教好几个学生，维持一家清苦的生活，不愿出去做官。他认为当时是贼官当朝，是乱世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不该出去做事。有一次，他的二儿子洙邻要去参加科举考试，寿先生执意不让去，竟将儿子关进书屋里锁起来。寿洙邻还是从窗户逃出去，终于考上举人，在黑龙江省一个县里当县官。后来儿子派人给寿镜吾先生送来一大笔银钱，孝敬他老人家；寿先生见后大发雷霆，骂道：“畜生，不听话！”要来人将银子原封不动的带回去。⑤

以“改变国民精神”，改造中国“国民性”为己任的鲁迅，对于知识分子如何摆脱“因袭”观念的问题，是尤为关注的。1925年2月29日所写的《通信》一文中，他对革命的道路、前途，还是作这样的设想：“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，民众俟将来再谈。”⑥而且在关于人生哲学、处世态度这一重大的、根本性的问题上，他更为注意，思考得更多。1919年11月，即写作《一件小事》的前一个月，他写的《恨恨而死》一文，就是侧重在批评知识分子“愤世嫉俗”的处世态度的。他说：“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。他们一面说些‘怀才不遇’‘天道宁论’的话，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，——因为不平的缘故，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。”又说：“中国现在的人心中，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。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，……但万不可单是不平。”“至于愤恨，却几乎全无用处。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，古人有过许多，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。”⑦在其他一些文章和书信中，鲁迅又多次谈到，对现实不满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他们的老毛病是“骄傲和玩世不恭”，好象“全世界的苦恼都萃于一身，在替大众受罪似的”；并指出这“正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脾气。”⑧

鲁迅还一再地指出这种“坏脾气”的危害性，劝告人们彻底抛弃这毛病。他说：“卑怯的人，即使有万丈愤火，除弱草外，又能烧掉什么？”“国民倘没有智，没有勇，而单靠一种所谓‘气’实在是非常危险的。”⑨他希望中国青年“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。”⑩

这里还要提到，鲁迅所指出知识分子身上这一传统的痼疾，实际上投身于民主革命洪流中的许多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，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。朱自清在《论气节》一文中，就曾这样谈论到：“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下”，“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‘节’这个标准。”“忠节与高节，都是个人主义消极的表现。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，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，甚至一些虚无主义者。”⑪据一部传记文学《郭亮的故事》的介绍：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主持《湘江评论》的编务时，郭亮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见面，两人倾心交谈时，毛泽东同志握着郭亮的手，笑道：“孔夫子说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我们恰恰与他相反，在这天下无道的时候却挺身而出，你说对吗？”郭亮道：“对得很！对得很！”可见，凡是自小受过孔孟儒家教育，读过“子曰诗云”系列古书的人，当他投身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

时候，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如何克服、抛弃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的传统观念。

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背负着的这一“因袭的重担”有了一定的认识，我们再来看作品中的描写刻画，定会叹服鲁迅的笔触，真是深中肯綮，锐利无比！小说的开头为什么要写“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……”？因为在那军阀混战的时代里，“乡下”所见的是民不聊生，满目疮痍；“京城”所见，则是窃据国家权柄的军阀统治者弄权、卖国的种种罪恶行为。“我”对社会现状的观察，不仅范围是广阔的，而且时间也是很长的；仅是“到京城里”来，也是“一转眼已经六年了”。六年来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的事情是“很不少”的。所有这些，大大加深了“我”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和体验：这是一个十足的“乱世”。由于“我”是打从“幼小时候”起，就“读过”许多“子曰诗云”之类的书，接受了孔孟儒家那一套“传统观念”；身处这“乱世”，“我”便很自然地采取“独善其身”的处世态度。而“愤世嫉俗”、“恨恨而死”的“坏脾气”，便是在这消极的处世态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。

在《一件小事》中，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落后的“传统观念”的挖掘和剖析，无疑是击中要害，非常深刻的；在现代、当代作家中，至今无人能企及。

我们应该进一步领会的是，鲁迅对这个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转变：“从坏脾气里拖开”，也是描绘得真实、深刻，很有说服感染力的。从时代环境来看：这是发生在“民国六年冬天”的事，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，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来，中国民主革命有很大起色，即将开始大转变的时候。从他个人的经济政治地位来看：“我”是属于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过着清苦的生活。他在“大北风刮得正猛”的冬天，“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”可见，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封建军阀的压榨，使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，生活更加贫困化；他们根本不能象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那样，可以“采菊东篱”，“种豆南山”，或是“躬耕垄亩”了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客观环境不容许他们走隐逸的老路了。

鲁迅眼光的深邃，还在于进一步表现出知识分子能超越原来的生活圈子，从下层劳动者身上去寻找助力，促进自己感情的转变。小说写“我”与人力车夫的接触，固然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。但就作者来说，能这样写决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充分的思想感情的蕴蓄的。“五四”时代，人力车夫问题已作为重大的社会问题，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。在北京居住的那个时期里，鲁迅外出常常乘坐人力车，与车夫有过许多接触；他曾在日记上多次记述，赞扬人力车夫的好品质。更重要的是，鲁迅早已敏锐地体察到，知识分子不能光从书本上讨生活，不能局囿在原有的生活圈子里；只有扩大生活实践的范围，开拓眼界，扩展心胸，才能跟着历史前进，适应时代的要求。他在《恨恨而死》一文中，就曾恳切地劝告那些抱着“恨恨而死”处世态度的知识分子：“诸公！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，弱水去黄河几丈么？火药除了做鞭炮，罗盘除了看风水，还有什么用处么？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？谷子是长在树上，还是长在草上？……四斤的担，你能挑么？三里的道，你能跑么？”你们“如果细细的想，慢慢地悔了，这便很有些希望。”

1939年5月，纪念“五四”运动20周年之际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，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，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：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，则将一事无成。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。”^②这就是“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”的重大的革命理论。在《一件小事》和《恨恨而死》等文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“五四”运动刚刚发生，新民主主义革命肇始之时，鲁迅对与中国革命发展有关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，就具有那么明晰、独到的看法和主张，实在是

难能可贵。还有《故乡》、《风波》、《祝福》等许多篇章，都是既写了知识分子，也更大程度上写了劳动人民；鲁迅总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写，而且都触及了人们的文化素质问题。这许多材料足以说明，鲁迅考虑中国文化的改造和革新问题，不是象某一些同志那样，把自己的眼光老是局限在知识分子身上的。

如何正确、全面地看待中国文化传统：发扬积极、优秀的因素，抛弃消极、腐朽的“因袭重担”；《一件小事》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。

有的同志断言：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传统的，而且进一步推演论证，提出当今的文化建设，应该“全盘否定”“中国传统文化”的主张^⑬。我觉得，这种见解显然是武断的。它首先是违背了人们的常识。因为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，包括将来的共产主义，决不排除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。列宁曾说过：“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、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。”^⑭谁都知道，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，并不是也决不可能是白手起家，或推倒重来的凭空创造，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加以改造，推陈出新。——我想，这些都是人们常识范围内的事，用不着多费唇舌来说明的。

文化这一概念包罗万象，文化传统也包罗万象。文化的载体是整个人类，整个人群，也包括一切文字典籍，一切物质、精神的产品和成果。总之，广义的文化，是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。任何人在研究、探讨某一具体的文化问题时，都只是从森罗万象中择取少许样品，加以分析，作出判断，指出其某一局部是落后的、过时的，或是进步的、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。所谓批判什么，否定什么，也只是针对该批判，该否定的某一局部而言，并不是指的整体文化。认为对某一民族、某一地域的传统文化，如中国传统文化，可以“全盘否定”，这一说法的本身，就是不合逻辑的，荒谬的。设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“全盘否定”的话，那么，中国人便不成其为人类，中国社会就该回复到“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”的境况中去了。

还是鲁迅有眼光，鲁迅的态度正确。他在早期论文《文化偏至论》中，就主张这样来建构新文化：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。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。”“五四”时期，对于文化传统中落后腐朽的东西，如封建礼教、家族制度，还有“士为知己者用”、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等等“因袭”观念，他的批判是猛烈的，坚决的。但是，同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是良好的部分，也注意保护和阐扬。例如，他说过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拚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^⑮

在《一件小事》的人物刻画，艺术描写中，也充分体现了这样科学的、实事求是的眼光和态度。对车夫的美好品德，作了虔诚的赞颂，固不用说。对于知识分子的“我”，也是充分地褒扬他的内在美质。在故事情节具体展开之前，首先就让我们知道：“我”已经“从坏脾气里拖开”。他所以能在思想感情上产生这样强烈、重大的转变，除了种种客观条件之外，更为重要的，是他主观上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：自省、慎独的精神。从小说中可以清楚的看到，“我”的思想感情转变的整个过程，完全是一个人独立、自觉地进行。“小事”发生的当时，内心引起强烈的震动；事情发生后，两三年来还“时时记起”，而且“时时熬了苦痛，努力的要想到自己”。解剖自己竟表现出如此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真是非同一般。平心而论，这“小事”实在也不过是一桩小事；拿一般人来看，是无足轻重的街边琐事；冷漠对待，无动于衷，倒是很正常的，不足为怪的。然而，它对于“我”却那样“有意义”，而且多少年过去了，“至今忘

记不得”。这样特殊的人，这样特殊的事，拿一般的眼光来观察领会是不够的。我觉得，鲁迅写“我”，刻画这个知识分子形象，是特意给他灌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美德：自省、慎独的。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^①《礼记·中庸》写道：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这类道德信条，千百年来，深深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；许多人在自己生活实践中，身体力行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而作者自己，就是保有“自省、慎独”精神的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。他说过：“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，然而更多地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。”^②又说：“我知道我自己，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。”^③在他的笔下，出现了“我”这样独特的具有“自省”精神的人物，不是偶然的。

在鲁迅看来，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“自省、慎独”的美德，是应该发扬的。可以说，《一件小事》就是弘扬“自省、慎独”精神的作品。发扬“自省、慎独”的优良传统，克服“自暴自弃”的“坏脾气”，这就是《一件小事》感人至深的中心题旨。如果说，“自省、慎独”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，也是要来一个“彻底否定”的话，那么，《一件小事》这篇小说，就不单是毫无价值，而且是该归入毒草之列了。我想，这样的结论，任何人都会认为是荒谬的。

我们必须认识到，“在文化战线上”，鲁迅不仅是“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”的，“空前的民族英雄”，^④而且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，发扬民族固有美德的可贵的民族骄子。——《一件小事》这一短小的篇章，适足为有力的例证。

鲁迅著作卷帙浩繁，鲁迅思想博大精深。鲁迅说过：“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，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。”^⑤鲁迅是祖国的精英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鲁迅精神就是照亮“国民精神前途”的明亮的炬火：火光在前，每一个致力于民族文化改革、振兴的炎黄子孙，应该知所勉策，知所奋发！

注释：

①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导言》。

② 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。

③ 司马迁：《报任安书》。

④ 《诗·小雅·北山》。

⑤ 参见《鲁迅在绍兴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。

⑥ 《华盖集》。

⑦ 《热风》。

⑧ 《两地书·二》、《“二心集”序》。

⑨ 《坟·杂忆》。

⑩ 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一》。

⑪ 朱自清：《标准与尺度》。

⑫ 《毛泽东选集·五四运动》。

⑬ 刘晓波：《选择的批判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
⑭ 列宁：《青年团的任务》。

⑮ 《且介亭杂文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？》。

⑯ 《论语》。

⑰ 《坟·写在“坟”的后面》。

⑱ 《而已集·答有恒先生》。

⑲ 《毛泽东选集·新民主主义论》。

⑳ 《坟·论睁了眼》。